

# 宋代洗儿诗初论

王友胜 吴春秋

**提 要** 洗儿风俗与洗儿诗歌均发源于唐代开元年间,至宋代渐趋流行与繁盛。宋代“洗儿”已形成以洗浴、赏赐、宴乐为主要内容的较为完善的礼仪,宋代洗儿诗就作者身份而言主要分为自题与题赠两大类;叙述婴儿降诞前的征兆,夸赞婴儿的非凡长相,期许婴儿美好的前程,这些既是宋代洗儿诗的主要内容,也构成洗儿诗的叙事模式。宋代洗儿诗由唐人洗儿诗发展、衍化而来,它彰显了宋诗题材生活化、琐细化的特征,蕴含着宋人浓厚的宗亲观念与强烈的功名思想。

**关键词** 洗儿诗 生成背景 类型 叙事模式 文化意蕴

## 一 宋代洗儿风俗的渊源与内容

洗儿礼是我国古代流传已久的一种习俗,即婴儿诞育三日或满月时会集亲友、宴请邻里,为婴儿洗浴以求吉祥的一种仪式,因多在降诞第三天举行,故又称“洗三”。<sup>①</sup>洗儿时宾朋云集,宴饮歌吹,谓之“洗儿会”;此时主人照例会对下人或来宾有所赏赐,所赐之物叫做“洗儿钱”;文人墨客还会写些表示祝愿与期许的话,称为“洗儿文”。“洗儿”之礼究竟起源何时,尚待确考,<sup>②</sup>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就曾发出“莫知其事例之所起”的感慨。<sup>③</sup>从已见的史料来看,唐代开元年间就已出现“洗儿”的风俗。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载“代宗之诞三日,上(玄宗)幸东宫,赐之金盆,命以浴。”<sup>④</sup>《新唐书》卷七七《列传第二·后妃下》亦据此记载“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代宗即当时皇太子李亨(即唐肃宗)的妻子郭氏在东都上阳宫所生之子李豫,其诞辰在开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三日

① 宋代有些地方将刚出生的婴儿溺死亦谓之“洗儿”,如王得臣《麈史》“惠政”条“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产不足以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宋]王得臣撰,徐鼎铭校对《麈史》卷上,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页。

② 按任士英《唐代的洗儿礼》,《文史知识》,1996年第1期,该文认为洗儿礼起源于唐开元年间,与玄宗以生日为节日(千秋节)及当时流行的浴佛节有关,但该文称“唐朝时是否已扩衍于宫外,尚难妄测”,“与唐朝不同者(宋代)是在婴儿满月时举行,而非三日时”,则前者失考,后者明显有误。

③ 《客斋四笔》卷6“洗儿金钱”条,见[宋]洪迈《客斋随笔》卷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84页。

④ 见[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洗儿时,玄宗亲自前来,赐金盆洗浴,这可能是“洗儿”的最早记载。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曾记载一个特殊的洗儿礼:“后三日,召禄山入内,贵妃以绣绷子绷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玄宗使人问之,报云:‘贵妃与禄山作三日洗儿,洗了又绷禄山,是以欢笑。’玄宗就观之,大悦,因加赏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物,极乐而罢。自是,宫中皆呼禄山为‘禄儿’,不禁其出入。”此谓安禄山生日(天宝十年正月初一)过罢第三天,杨贵妃特召其入宫,替她这个年满五十的“干儿子”补办洗儿仪式。玄宗开元、天宝后,此礼在晚唐得到沿袭,韩偓《金銮密记》载“天复二年,大驾在岐,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子、金银钱、银叶坐子、金银挺子。”昭宗李晔在动荡流离中,还不忘为公主举行洗儿礼,可谓宫掖相承,欲罢不能。除宫廷外,唐代一般权贵、富豪之家亦有诞育三日“洗儿”的风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载:开元十八年(730),大臣王毛仲妻李氏诞育三日洗儿,玄宗“命(高)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白居易的《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诗也记载监察御史谈弘谟洗儿之事。

宋代承袭唐人洗儿的习俗,从宫廷到民间,社会各阶层中都广泛盛行,“洗儿礼”的仪式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极大地完善,其奢华热闹程度比起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洗儿的时间除了三朝外,还可以是满月时,如苏轼说“况闻万里孙,已报三日浴。”(《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王禹偁则说“洗儿已过三朝会,屈客应须满月筵。”(《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而杨万里的《贺必远叔四月八日洗儿》云:“年年四月初八日,水沉汤浴黄金佛。今年大阮当此时,真珠水洗白玉儿。”这是在佛浴日洗儿,算是特例。宋人洗儿的风俗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条载“就蓐分娩讫,人争送粟米炭醋之类。三日落脐灸凶,七日谓之一腊,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钱,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并果子,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煎香汤于盆中,下果子、彩钱、葱蒜等,用数丈彩绕之,名曰围盆;以钗子搅水,谓之搅盆;观者各撒钱于水中,谓之添盆。盆中枣子直立者,妇人争取食之,以为生男之征。浴儿毕,落胎发,遍谢坐客,抱牙儿入他人房,谓之移窠。”<sup>①</sup>可见宋代“洗儿”的礼仪非常繁琐、复杂,场面非常铺排、奢华,婴儿降诞三日时,要为其举行“落脐灸凶”的仪式,以示新生之子完全脱离了胎儿期,从此正式踏上了人生旅途;满月时,家人要邀请亲朋友好,举办洗儿会,用香汤为婴儿洗澡,在经过围盆、搅盆、添盆等程序后,还要抱婴儿逐一认亲。除了洗浴,主人在洗儿会上还要赠赏、宴乐,并且耗费的财物还相当的多。徐鹿卿的《贺判府生子》曰“觅公洗儿钱”,陈藻的《丘景运生孙叔南生子戏赠以诗二首》(其二)亦云“莫道丘公孙是女,林郎初画洗儿钱”,这是诗中的描述;笔记中记载得更详细,《铁围山丛谈》卷四“祖宗故事,诞育皇子公主,每侈其庆,则有浴儿包子,并赉巨臣戚里。包子者,皆金银大小钱、金粟、涂金果、犀玉钱、犀玉、方胜之属。”《容斋四笔》卷六“洗儿金钱”条“车驾都钱塘以来,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则戚里、三衙、浙漕、京尹,皆有饷献,随即致答,自金币之外,洗儿钱果,动以十数合,极其珍巧,若总而言之,殆不可胜算。”<sup>②</sup>可见宋时逢皇室诞育,无论男女,各有司衙门均要盛情进献,皇上照例也会及时回赠,糜费财物,不可胜数。正因如此,大臣刘敞在嘉祐四年四月即上

①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2页。又《梦粱录》卷二十记载“洗儿”详细的仪式与事项,与《东京梦华录》一书所云大同小异。

② [宋]洪迈《容斋随笔》,第685页。

《论皇女生疏决赐予疏》予以劝止“在外群情,皆云圣意以皇女生,故赐庆泽,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闻多作金银、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钱,及铸金银为花果,赐予臣下,自宰相、台谏,皆受此赐。臣谓陛下无益之赐,无名之赏,殆无甚于此。若夸示奢丽,臣以辅主为职,奈何空受此赐,曾无一言焉?遂事不谏,臣愿陛下戒之。伏惟皇上开祐圣德,故后宫有多子之祥,陛下当明谨政令,深执恭俭,以答上天之赐,建无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损政体,出浮沉之费,以隳俭德。”<sup>①</sup>刘敞此疏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为我们留下了考察宋人洗儿风俗的珍贵史料。洗儿会上举办宴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王禹偁的《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诗末句云:“至时担酒移厨去,请办笙歌与管弦。”既“担酒移厨”,又有“笙歌与管弦”,足见洗儿的场面非常热闹;前揭杨万里“今年大阮当此时,真珠水洗白玉儿”的诗句也明确告诉我们,南宋洗儿时是有乐器大阮弹奏的。

由上可见,“洗儿”这一习俗最晚起源于唐代开元间,至宋代则体类完备,蔚然成风。然其礼节繁缛,靡费财帛,故洗儿会多适用于皇室宦家,或富贵之门,民间老百姓举行的洗儿礼相对要简单得多,正所谓“贫下之家,则随其俭,法则不如式也。”<sup>②</sup>

## 二 宋代洗儿诗的生成背景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有它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宋代洗儿诗的生成也是这样,它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唐代洗儿诗的发展与影响,二是宋诗题材的生活化、琐细化。

洗儿诗几乎与洗儿的习俗同时出现,早在开元年间,岐王李范的门客张鄂就撰有《三日岐王宅》与《满月》两诗,前诗曰:“玉女贵妃生,婴儿始发声。金盆浴未了,綈子绣初成。”“金盆”为洗浴的器皿,“綈子”类似襁褓。中唐王建《宫词》(其七一)亦曰:“日高殿里有香烟,万岁声长动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后宫诞育时,大家齐声高呼“万岁”,宫女们争着讨“洗儿钱”。五代时期前蜀花蕊夫人《宫词》(其六三)说:“东宫降诞挺佳辰,少海星边拥瑞云。中尉传闻三日宴,翰林当撰洗儿文。”可见当时洗儿诗的写作已成气候。不过,唐代洗儿诗写得多而好的诗人当属白居易,如《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诗云:“玉芽珠颗小男儿,罗荐兰汤浴罢时。茱萸春来盈女手,梧桐老去长孙枝。庆传媒氏燕先贺,喜报谈家乌预知。明日贫翁具鸡黍,应须酬赛引雏诗。”还有《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见示因以二绝和之》(其一)诗:“洞房门上挂桑弧,香水盆中浴凤雏。还似初生三日魄,嫦娥满月即成珠。”诗中提到“兰汤”、“香汤”,说明当时洗儿不是用清水。据孙思邈的《千金方》记载,“儿生三日,宜用桃根汤浴”,因为这种汤能够“去不祥,令儿终身无疮疥”。宋代洗儿诗词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写法上明显承袭唐代而来,其创作的数量与所达到的艺术水平都要超过唐代洗儿诗。据不完全统计,两宋约有11人写过17首洗儿诗,分别是王禹偁的《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欧阳修的《洗儿歌》、梅尧臣的《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苏轼的《洗儿戏

<sup>①</sup> 《全宋文》第5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sup>②</sup>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20“育子”条,见[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08页。

作》、《贺陈述古弟章生子》、《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黄庭坚的《嗣深尚书弟晬日》、李廌的《王实洗儿歌》、朱松的《洗儿二首》、王十朋的《万先之生两男作洗儿歌贺之》、杨万里的《贺必远叔四月八日洗儿》、陈藻的《丘景运生孙叔南生子戏赠以诗二首》、《子从生儿席上作》及徐鹿卿的《贺判府生子》等。就作者的身份与知名度而言,既有著名诗人,亦不乏声名不显者,可见洗儿诗创作在宋代具有广泛性。

宋代洗儿诗词大量出现与宋代诗人在题材上开拓创新,追求题材的琐细化、生活化密不可分。众所周知,唐诗已经达到了中国诗歌创作的顶峰,宋人要有所作为,必须另辟蹊径,在题材与意境上下功夫。宋诗在气魄上虽然略逊唐音,但在诗歌题材的拓展、创新上却较有唐一代为优,其诗歌题材广博、细密、精巧的风格特色正是他们创作追求新变,自立门户的结果。莫砺锋说“宋诗在艺术上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又云“宋诗较成功的题材开拓是向平凡的日常生活倾斜,唐人注意不够的琐事细物都成为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有咏农具之诗,黄庭坚多咏茶之诗。”<sup>①</sup>梅尧臣历来被认为是宋诗的“开山祖师”,他的这一诗史地位正是其在拓展诗歌题材上所做出的努力达到的。钱锺书评价梅尧臣及其诗歌创作时说“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句来写琐碎丑恶大不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呼噜之类”,<sup>②</sup>这里虽然是在批评梅尧臣诗有过度琐碎的缺点,但我们仍然从中可以看出宋诗题材与宋人生活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宋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洗儿礼的题材出现在宋诗中就是水到渠成的了。翻开《全宋诗》,我们不难发现,宋代早期洗儿诗的作者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恰好是对开拓宋诗题材,确保宋诗自立比较重要的诗人。王禹偁《小畜集》卷十一所收录的《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应该算是宋代第一首洗儿诗。梅尧臣与欧阳修的洗儿诗,一为自题,一为题赠,彼此唱和,既写题中应有之意,又多有所申诉,借题发挥。

此外,宋代洗儿礼仪的衍生与发展还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文化为保障与基础,没有宋代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没有宋代文人优裕的物质生活,没有宋代文人相互交游、彼此唱答的文坛风气,宋代洗儿诗的大量出现也是不可能的。

### 三 宋代洗儿诗的类型与叙述模式

洗儿诗,顾名思义,指婴儿降诞三日或满月举办洗儿礼时,所作以洗儿为主题,传达得子之喜,或寄托长辈对新生儿祝福与期许的诗歌。洗儿诗包括得子之人自创之作,以及他人题写、唱和之作,也就是说,就作者的身份而言,宋人洗儿诗创作有自题与题赠两大类型。前者主要有梅尧臣的《依韵答永叔洗儿歌》、苏轼的《洗儿戏作》与朱松的《洗儿二首》,王禹偁的《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欧阳修的《洗儿歌》等其余诗则属后者情况。

自题洗儿诗在写法上多以长辈身份祷祝子女将来的一生幸福安康,有时也会由子及己,感慨身世,抒发对社会与时事的不满,从而与咏怀抒情诗合流。梅尧臣的《依韵答永

① 莫砺锋《宋诗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② 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叔洗儿歌》是对欧阳修《洗儿歌》的唱和之作。据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所考,此诗当写于嘉祐三年(1058),<sup>①</sup>此时梅氏已五十六岁,可谓晚年得子,故作者自谓“我惭暮年又举息”。诗的前半部分写婴儿降诞前作者夜梦道士、仰看星辰,寓示婴儿出生不凡;接着写婴儿降诞后以药辟邪、友朋庆贺及为孩子金盆洗浴的情形。后三句由子及己,以唐代狷介穷苦的文人卢仝晚年得子自况,感慨身世,抒发自己一生仕宦不显,坎坷潦倒,得子乃成一慰的心情。苏轼的《洗儿戏作》可以说是宋代自题洗儿诗的代表作,虽是七绝,寥寥二十八字,但影响比较大,后世许多文人都爱引用、唱和。一般自题洗儿诗按惯例会对初生的孩子寄予厚望,此诗却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首诗运用反语,无理而妙,制造了一个“聪明”与“愚鲁”的价值观上的冲突,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突转”——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相反的方向,<sup>②</sup>这样的对比往往会形成一种悲剧式的情感。此诗作于元丰六年(1083),诗人刚刚经过牢狱之灾,故其主题在于讥讽权贵,诉说平生失意,不在洗儿事本身。其实苏轼的这一思想渊源有自,《论语·先进》篇早就说过“柴也愚,参也鲁”,柴高与曾参都是当时有名的贤哲,孔子却以“愚”、“鲁”期许;白居易的《哭皇甫七郎中》诗亦云“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苏轼深受政治斗争的折磨,深知才高受谤,貌美遭妒,故追求大智若愚之“愚”,鲁钝之“鲁”而非鲁莽之“鲁”,这才是苏轼对其爱子真正所期望的。清代苏轼研究著名学者查慎行就已明确看出“诗中有玩世疾俗之意”(《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二二)。此诗因其立意之奇而引起后世文人争相唱和,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载,瞿佑撰诗反《洗儿戏作》意曰:“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和了一首《洗儿诗》:“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明末清初钱谦益亦写《反东坡洗儿诗》曰:“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此外,朱松的《洗儿二首》绝句,也属自题之作。朱松是理学大儒朱熹的父亲,这两首洗儿诗便是他在建炎四年(1130)得第三子朱熹时所写。其一云:“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从“旧学屠龙”、“助征戍”、“更冠儒”等词语来看,朱松最初是想将朱熹培养成武士而非文儒,这或许与当时赵宋王朝被迫南渡,投降派秦桧力主和议的时局有关,朱松是主战派,故有这样的感慨。其二云:“举子三朝寿一壶,百年歌好笑掀髯。厌兵已识天公意,不忍回头更指渠。”作者以三朝洗儿之事为楔子,以此讽刺赵宋王朝腐败无能,偏安江左的丑恶罪行,抒发自己壮志未酬、河山分裂的痛苦心情。这两首诗虽然篇幅短小,但写得颇有气概;若论讽喻,较之苏轼的《洗儿戏作》,似乎难分伯仲。

至于题赠洗儿诗,也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只传喜言乐,并述祝祷之语,言语平直,诗意浅易之作;二是多以典故铺陈,文字典奥华赡,诗意隐晦之作。前一类诗,我们试从王禹偁的《张屯田弄璋三日略不会客戏题短什期以满月开筵》为例加以论说。从“弄璋三日略不

① [宋]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9—90页。

会客”与“期以满月开筵”等来看,表明作者虽在婴儿降诞三日时写诗表达了祝愿之情,但主人似乎要等到孩子满月时才会举办洗儿会;又曰“戏题短什”,可见作者乃随意创作,与兴、观、群、怨的诗教无缘,这正是宋诗题材日常生活化的具体表现。诗中既叙双方“相知二十年”的友谊,又曰“桂子定为前进士”,不忘客套地恭维几句,更表达了对“满月筵”笙歌管弦热闹场面的期望。王禹偁是宋初白体诗人的代表,该诗题目与白居易的《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颇有相通之处,其“偶吟成篇”、“戏呈梦得”,亦即王氏的“戏题短什”;诗中“喜君新咏弄璋篇”,白居易的《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见示因以二绝和之》(其一)亦有“弄璋诗句多才思”的诗句,两人皆用《诗经·小雅·斯干》中“弄璋”的典故,点明了主人“生男”的意思。此诗内容上比较平淡,起伏不大,尤其是后三联“洗儿已过三朝会,屈客应须满月筵。桂子定为前进士,兰芽兼是小屯田。至时担酒移厨去,请办笙歌与管弦”,平铺直叙,并未用典,亦是典型的白体诗风。

后一类型的诗以欧阳修的《洗儿歌》与苏轼的《借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等为代表,《洗儿歌》诗题一作“前日送酒,遂助洗儿,辄成短歌,更资一笑,呈圣俞”,当是为老友梅尧臣晚年得子而作。欧阳修时的宋代诗坛堪称“宋调初成”,此期的宋诗开始渐渐摆脱唐诗的影响,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文人好用典故。此诗用典即较多,开头“月晕五色如虹蜺,深山猛虎夜生儿。虎儿可爱光陆离,开眼已有百步威”四句,化用《后汉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典,<sup>①</sup>“木星之精为紫气,照山生玉水生犀”一联,前句用老子李耳出生和骑牛过函关之典,<sup>②</sup>后句以山玉、水犀等珍贵之物作比兴。诗中叙述古代英雄与先贤的事迹,为的是表达对主人“才高位下”的惋惜与同情,最后几句乃劝慰与祝愿之辞“翁家洗儿众人喜,莫惜金钱散闾里。宛陵他日见高门,车马煌煌梅氏子”。此诗用语秾艳而不柔靡,故南宋黄震评价“《洗儿歌》为圣俞作,简而劲。”<sup>③</sup>苏轼的《借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诗用典更多,如“大壮泰临复”、“举家传好梦”、“可以耕衍沃”、“端解耗纸竹”、“我计久已熟”、“长留五车书”、“箪瓢有内乐”、“早谋二顷田”等句,皆以典入诗。其中“举家传好梦”一句乃应景之典,典出《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二句。此为熟典,宋代的洗儿诗多陈陈相因。

宋代洗儿诗皆有大致类似的叙述模式。这些诗在内容上可以说大同小异,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以下几句话“我前不久看到了征兆,过几天你果然得子了,真是有福之人”,“你的孩子长得很有福份,与一般人就是不一样”,“你的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或者“我祝愿你的孩子未来前程无量”。其创作模式,也是有轨可循的,实际上就是上边那三层意思体现出的三个步骤,一步一步,由头及尾,话说完后便成了诗。首先,作者先来个“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一类的伏笔,如梅尧臣的《依韵答永叔洗儿歌》曰:“夜梦有人衣帔蜺,水边授我黄龟儿。仰看星宿正离离,玉魁东指生斗威。明

① 《后汉书·班超传》载“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三国志·吴志·吕蒙传》亦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②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玄妙内篇》云“玄妙玉女梦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裴骃《史记集解》引《列仙传》云“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见[汉]司马迁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9—2141页。

③ [宋]黄震撰《黄氏日钞》卷61“文骚以婉”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第508页。

朝我妇忽在蓐,乃生男子实秀眉。”李廌《王实洗儿歌》云:“昔闻吉梦占熊罴,今见得子如阿戎”,又王十朋《万先之生两男作洗儿歌贺之》亦云:“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熊罴入梦非同时”,这是在用典言祥瑞之兆,以衬托福气。在这一个层次上,又有言其祖上梓里人杰地灵的,同样是伏笔,既为了衬托天遗子嗣之喜,又为下边第二层次的称赞做铺垫,如徐鹿卿的《贺判府生子》开宗明义:“西江最上流,南安古名城。庾山蔚然秀,章水浏其清。异代得伟人,分此风月平。往者程伯温(程珌),关决泮有声”。其次,便是开始称赞主人之子的言辞,所谓“兰孙桂子”之类,极尽夸赞之能事。如黄庭坚的《嗣深尚书弟晬日》“骨秀已知骐驎子,性仁端是凤凰雏”,苏轼的《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释氏老君曾抱送。壮气横秋,未几三朝已食牛”,陈藻的《子从生儿席上作》“造化安排生,必也非凡儿”之类。最后,便是将古代的圣贤搬出来作榜样,从黄帝、周文王姬昌到孔子、释迦牟尼,如李廌的《王实洗儿歌》“五侯七贵十八公,当有八元为八龙”,王十朋的《万先之生两男作洗儿歌贺之》“徒烦孔子与释氏,两回抱送麒麟儿”,“他时四乳类周士,森森八桂同敷荣”等等,都成了与新生儿比肩的对象,表达了对孩子未来美好的愿望,不管作者是否出于真情,反正都得这样客套恭维,主人也决不会嫌其僭越。但有时客套得过头了,便显得露骨而气格卑下,如王十朋诗中“慈颜戏语彩衣郎,汝子他年胜我子”、“我忝通家同笔砚,闻君得子欢无间。殷勤为作《洗儿歌》,觅取金钱三百万”这六句,<sup>①</sup>前两句像马屁精说的话,后四句则体现出了一个十足的文丐形象。

苏轼除自题《洗儿戏作》外,还有三首题赠之作,即《借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贺陈述古弟章生子》及《减字木兰花》(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会客作此词戏之),后两首一是题赠友人陈襄之弟陈章,一是题赠友人李公择,内容落入一般洗儿诗的窠臼,写法也平淡无奇,只有“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谢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依?”几句,多少体现出一点文学幽默味。前一首诗题赠胞弟苏辙,或许是因为主人是自己亲弟兄的缘故,所以这诗里的感情和风格与后两首截然不同,当是此类诗之最佳者。前掲指出,一般洗儿诗多是赋颂铺陈之语,千篇一律、如出一辙,看得多了,让人不免感觉到厌烦。苏轼此诗虽也有祝贺之意,但写诗的主要目的是在规劝,诗中大量篇幅在劝说苏辙该如何及时避世归隐,如何培育苏家的第四孙斗老,诸如“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须富文章,端解耗纸竹”,“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箪瓢有内乐,轩冕无流瞩”,“早谋二顷田,莫待八州督”等,情真语切,令人动容。之所以多劝勉、关怀之辞,是因为二苏情同手足,患难与共,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曰:“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再者,苏洵既亡,长兄为父,侄子即犹子,苏门添丁,非独苏辙一人之事,乃苏家一门之事。这样的风格主旨,在题赠类洗儿诗中可谓独树一帜。

#### 四 宋代洗儿诗的文化内涵

宋代洗儿诗是宋代诗歌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类题材,它既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现实与风俗民情,同时又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义。

首先,宋代洗儿诗体现了古代社会浓厚的宗亲观。《孟子·离娄上》云:“不孝有三,无

<sup>①</sup> 《万先之生两男作洗儿歌贺之》一诗,见[宋]王十朋撰 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

后为大。”东汉经学家赵岐释曰：“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自汉文帝置《孝经》博士后，《孝经》开始流行于世，赵岐的解释正好迎合了当时人们普遍奉行的孝道观，故被奉为圭臬，影响中国近两千年，人们普遍认为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即是福，于是若有新诞的孩儿，这便是天大的喜事。这种宗亲观念亦深刻的影响着封建时代的文人们。洗儿诗里所蕴含的这种宗亲观，其源头可以上溯到《诗经·周南·螽斯》，所谓“宜尔子孙，振振兮”、“宜尔子孙，绳绳兮”、“宜尔子孙，蛰蛰兮”，《毛诗序》、《诗集传》都解释为言周室子孙众多之事，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在对此篇进行解题时，亦言“美多男也”。洗儿这一风俗发展至宋代，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仪制度，这为宋代的洗儿诗创作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洗儿这一风俗，实际上是宗亲观念的一种体现，与洗儿相关的众多形式，都映射出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期许，一种期待后代能有所作为的愿景，如宋代文献中所提到的洗儿汤中加入葱、蒜、枣等物，皆取物之谐音，希望孩儿能够聪明、早立。

其次，宋代洗儿诗彰显了宋代文人强烈的功名观。春秋以降，儒家伦理思想中已经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是立功，其次是立言，虽久不废。”在宋代的洗儿诗当中，长辈对晚辈的期盼，基本上都没有跳出这“三不朽”的藩篱。无论自题还是题赠洗儿诗，作者都会期许婴儿未来能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杨万里的《贺必远叔四月八日洗儿》：“吾家英杰相间起，胄出关西老夫子。公家宣和中大夫，大江之西推名儒。六十年來谁继渠？愿儿长成读祖书，再起门户光乡闾。”<sup>①</sup>纵使苏轼的《借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一诗，表现出的是一种消极隐退的思想，但这种避世的价值观，只是作者对他们兄弟二人人生归宿的一种期待，而非对待下一代；他真正对下一代的期望体现在“常留九车书，要使九子读”这一句中，因为“学而优则仕”，又有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自隋代以科举取士以来，读书与功名的关系不言而喻。宋代亦然，读书至仕毫无疑问是立德立功的最佳选择，实在不行，还可以退而立言，潜心文章学术，在那样一个崇文抑武的时代，亦可以丹青留名。洗儿诗作者对下一代功名的期许，实际上寄托了希望上一代的生命在下一代身上得到延续，上一代的人生价值在下一代身上得到体现的心理。宋代洗儿诗中提及的古人，往往是周公、孔子之类前代圣贤或英雄，而非凡夫俗子，其原因正在于此。后来民间洗儿时念诵的民谣“长流水，水流长，聪明伶俐好儿郎”，“先洗头，做王侯，后洗沟，做知州”，传达出的文化意蕴也是如此。

（作者通讯地址：王友胜 吴春秋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 411201）

（责任编辑 晓 思）

<sup>①</sup> [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24，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64页。